

中国世纪

中国能成为世界强国？

CHINA CENTURY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21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中国世纪

中国能成为世界强国？

《21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世纪 / 《新世纪经济报道》编辑部编著. —北京: 中国华夏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80-3412-0

I. 中... II. 2...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443 号

《21 世纪经济报道》丛书

中国世纪

《21 世纪经济报道》 编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1/16 29.5 印张 640 千字 3 插页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在 21 世纪经济年会上的欢迎辞(代序)

21 世纪报系发行人 沈 颢

与加入 WTO 后的中国一起成长,是《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创刊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期待。成长与革新,一个是对未来之路的假设,一个是对现实状态的颠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命题,也是一个企业的命题。同样地,也是一张以探讨“国家、企业、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以“新闻创造价值”为使命的报纸的重大命题。

三年来,《21 世纪经济报道》团结中国一切向上成长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来自政府或民间、政治或经济,来自生产、知识或资本,来自教育、传统或创新,这些力量的汇集与记录,使《21 世纪经济报道》成为中国商业报纸的领导者。这张报纸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把中国的商业命脉当成未来的国运来对待,经济的输赢就是国家的输赢,而经济的输赢建立在企业的输赢之上。

企业,这个最具力量的单词,已经超越了“生产力”的界定,甚至超越了国界,成为全球化潮流下群体的生存方式。而企业的现实,企业的未来,正是今天我们 21 世纪经济论坛所探讨的焦点。

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希望大家多提出问题,也希望大家在相互探讨中将一些疑问转化成未来的动力。

历史的心跳(序二)

《21 世纪经济报道》主编 刘洲伟

21 世纪能否成为中国世纪？这是一个问题。甚至提问本身都充满了挑战。但历史常常是在疑问中开始的。中国世纪，一个伟大命题的勇敢追问。一种可能实现的路径探寻，一个国家图腾的自觉与自省。梦开始的地方，我们听见历史的心跳。

13 年前，日裔美国人福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宣告了资本主义实践在西方的完成，尤以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的强大为标本——即对所谓“美国世纪”的又一次提示。几年后，另一位美国人亨廷顿在同样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特别关注了中国在东方进行的另一场实践，强烈暗示了一个“中国世纪”的可能性——这一提醒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论点遥相呼应，互为镜像。一个时代仍在延续，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21 世纪会成为“中国世纪”吗？

我们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毫无疑问我们在见证历史。选择在新世纪第一天出生，并以此命名的《21 世纪经济报道》，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使命，去见证一个“中国世纪”的发育生长，去见证国家梦想的实践与兑现。三年以来，这一初衷不曾改变。

不断改变的是我们作为记录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能力。2002 年底，我们从周报扩展为一周两期，改变了中国商业报纸的竞争规则。2003 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内容结构上做出重大改变,明年的报纸形态上,21世纪时评版块、21世纪政经版块、21世纪国际版块将成为劈开市场屏障的“三板斧”。

这一改变的逻辑来自于对本报读者需求的深刻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不再是独沽一味的政治诉求,取而代之的是更全面更持续的发展观。我们的读者,中国最优秀的人群,政治与商业精英阶层势必与时俱进。《21世纪经济报道》有机会成为新主流媒体或新权威媒体,以市场化的媒体力量阐释演绎政经格局的最新动态。

《21世纪经济报道》同样有兴趣成为中国本土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孵化器,他们理性观察,格物致知,而不是半吊子的西方知识界的二传手。

《21世纪经济报道》将更加国际化。在现有的海外专栏作者队伍之外,我们将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开辟新的记者站。

针对忠实读者的批评,《21世纪经济报道》在未来一年将使文章的深度、品质和阅读愉悦有足够的提升。

与中国世纪一起生长,改变让我们走向光荣与梦想。

目录/CONTENTS

观察家·企业家·经济学家

天 问

执政为民·新政府元年·公共产品·法治·大国新定位

天下为公

穿越故乡天下黄花·穿越东部黄金海岸·区域冲动·SARS 周年祭

国家穿越

增长杠杆·财税新伦理·金融新洋务·资本摇篮

国资前途·新土地运动·资源白皮书·贸易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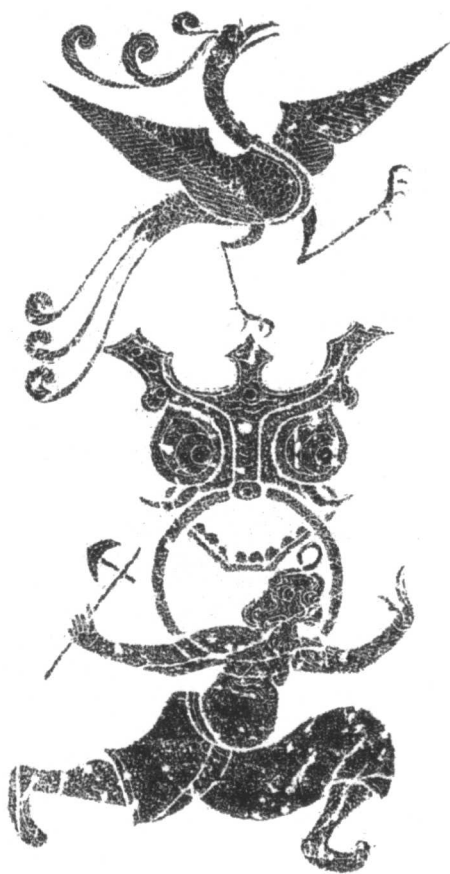
效率中国

WTO:外力与内力·科技力·人力·民营力·文明力

建设的力量

中國
世界

天 问



观察家
企业家
经济学家



天问：观察家

甘阳 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21 世纪》：21 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 20 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甘阳：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 21 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 20 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 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 20 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 20 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 21 世纪。我以为，21 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 21 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





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

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梁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梁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梁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铸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受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计，在梁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像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灭亡。在我看来，如果梁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21世纪》：你的意思似乎是，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甘阳：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金重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另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吴铭采写）



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就是她的自由空间的拓展。这种内外兼修的拓展不只是一代人的事业，也不只是三四代人的事业。一个能够真正崛起的民族国家，恐怕每时每刻都得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这一代人能给子孙后代开辟多大的可供他们自由驰骋的空间？

小小寰球风云变幻，弱者自弱，强者自强。一个国家的自由空间，只能在严峻的全球竞争中求得。经历过国际竞争磨练的中国企业家已经看到，即使中国已经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满足了 WTO 要求的各项条件，他的企业仍然要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特保等市场对抗的挑战。国家的竞争也一样。国家之间不会因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趋同就从此消弭纷争，走向永久和平。每个国家都将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朋友与敌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命运。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与不公只能依靠不断谈判或者对抗才能解决，要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重新分配利益，永保世界和平，根本就不可能。

一种受惠于全球化的温情暖意使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需自立，以为从此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而非民族的未来。不过，是否要为了一个自由的“大同世界”的虚无未来，去抹平民族国家的区分？力量惊人的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的，其实是当前的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部分利益群体宁取眼前利益，而反对民族的未来。但这些反对者们最后将发现，如果一个民族迷恋某种全球化的价值而奔赴虚无的“大同世界”，这个宁愿离土漂泊的民族除了沦为附庸之外别无出路。信奉自由市场的诸种价值和伦理，并不意味着信奉者就可以因此而扩大自己的自由空间。

我们的一切价值追求和竞争努力的最后归属只能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一个寻求崛起的民族国家，不能只是为一代人的尺寸得失而计较；要在全球竞争中经受住考验不败下来，就必须为未来而思考。刚过 110 周年诞辰的毛泽东等共和国缔造者的战略宏图因此值得追忆。建国初期，这些战略家们果断决定让民众勒紧裤带加紧发展“两弹一星”。很难想像，没有此番努力，中国将在世界有何种地位；他们不只是在为自己那一代人谋划，而且在为民族的未来、为子孙后代谋划。

今天的改革者在重寻崛起之路的时候，自然也应该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应该继承这一“天问”——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拿什么去开创未来？

我们能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竞争。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素质。我们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应该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自立与竞争的责任。有国家在宪法里明确宣示，“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大都记得这个承诺，自觉接受这一国家的“天命”；他们也知道，世界上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必须要通过开拓这一有限空间而实现。在本国公民自由得以保障的情况下，竞争是它的价值观的核心。其实对于每个独立国家来说都如此。除了去承担这种竞争，并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分裂的社会，而是达成社会联合的民族国家。必须形成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竞争，而只有充分保障公民人权才能培育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目前国家根本大法的建设既重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又重对土地被占用的农民的“补偿”，以及执政党标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方针，都提示着新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良好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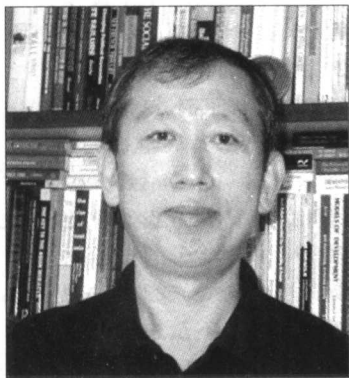
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软弱的主权，而是稳定而强大的国家主权。通过选举制度的安排实现主权在民的制度格局，将国家主权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是建构强大的主权力量的根本之道。最近中共中央建议突出国家主席在外交上的地位，凸显了国际事务对中国的重要性上升的事实。以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尚未举足轻重，外交在中国占的比重实际有限，但今后中国的一切事务都将是国际事务，国际上的一切也都将强烈影响中国，因此国家主席在国事活动中的地位很有必要从全球立场进行定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重建甘阳先生所说的“文明—国家”；只要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中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目标。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代人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面前的责任。这一代人也许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是否会成功，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承认这一代人是先驱者。这一代人惟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到来驱马先行！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

王绍光：和平崛起与国家良治



21 世纪：多元世界

《21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不知你认为这个说法能否成立、在何种意义上成立？

王绍光：这个说法有很长历史了，更多表达人们一种良好的期待。但是在学术上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说法，我觉得没有准确含义。它是说中国在21世纪是超强的经济体，还是超强的国家，说这句话可能对鼓舞士气有益，但是除此之外我不觉得它有太大的作用。

《21世纪》：从文化角度来谈哪一种文化能够成为21世纪的领先文化似乎争议非常大，而且也的确非常模糊。不过最近关注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变化，国内外的媒体、学术界、所有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将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的国家。

王绍光：至少有一点基本上可以确定，那就是在21世纪，中国无论在哪一方面，经济、文化、政治，甚至军事上，可能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我觉得是蛮有信心的。



从过去 25 年甚至 50 年来看，中国是在一个不断加大其影响力的过程。尤其温家宝总理最近访问外国，提到过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中国人受尊重了。在别的国家的人看来，受到外国的尊重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感受还是不同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并不那么受尊重。在 21 世纪延续过去 25 年的进程，我觉得可以期待，但是能不能将 21 世纪称为中国人的世纪，或者是独领风骚，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世界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

他们的焦虑

《21 世纪》：温总理 12 月上旬的访美之行在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倍受关注。我们也注意到他 10 日访问哈佛大学时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观点。从你的专业角度，怎样理解“和平崛起”这一战略？

王绍光：“和平崛起”这一战略是有很大意义的。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所谓“现状派”和“修正派”之分。“修正派”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比较快，随之就有一个扩张的过程。这个在欧美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里面是主流派。现实主义预定一个国家发展迅速必然走向扩张，他们经常举的较近的两个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他们预计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一定会向外扩张。

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它反映出一种焦虑，要对形势做最坏估计。也许中国崛起了不会“修正”世界格局，但是他们会假设最坏情况的出现。现实主义里面有一种隐含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它总是做最坏的打算。历史上所有的经验都告诉人们国家相对地位的改变会导致扩张，为什么中国会是个例外？中国学者出国参加会议往往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就是对现实主义以及其他带有各种情绪的中国批判者的回应，回应国际上的怀疑——中国到底会不会采取合作的、和平的方式来发展自己。

《21 世纪》：这种和平崛起论，跟前段时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有没有关系？

王绍光：中国威胁论最早开始说的人并没有太多理论，最初是从日本来的。但后来很多做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接受了这个说法，有这个理论来解释这种焦虑，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有理论基础的焦虑。

《21 世纪》：在这个发展阶段由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提出这种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你觉得有没有策略上的考虑？

王绍光：我想它无非是减少阻碍。每一次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都会强调中国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即便将来发展了也不会称霸。这种讲法是必要的。

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讲”可以消除一些非西方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国家的顾虑。他们最近一些年看到跟中国合作会带来很多好处。而且在解决国家边界问题时中国现在总是采取愿意协商、讨论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态度。所以东盟国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崛起的战略，较少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但美国绝对会做最坏的打算，绝对会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从它的国家利益，从它的传统，它都不可能改变成另外一种态度。

“良治”国家与八项“国家能力”

《21 世纪》：“和平崛起”论应该说顾及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外，国际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强调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注意国内的体制创新，依靠国内改革来解决经济发展、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你觉得这一战略



对解决国内问题有何建设性意义?

王绍光:最近中央提到“五个统筹”,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要协调国际和国内的发展。

“和平崛起论”把国际国内两方面都统一起来了。它既要“崛起”(这是中国人的期望),又要“和平”(这既是中国人的期望,也是中国人想说服其他人的理由)。这两者中,崛起是主要的。崛起无非就是说,我们能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使经济在连续、高速增长25年之后再继续增长25年、30年。如果能成功,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林毅夫认为我们可以再增长个30年。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最终保证。所以需要制度上的改善。

《21世纪》:可是历史经验说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不可能是凯歌式行进的。我们也注意到你稍早时候与清华大学的胡鞍钢、丁元竹两位学者对中国的发展与稳定问题做出了严重警告。

王绍光:所以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上面我们谈到的崛起也罢、和平也罢,都是中国人民的期待。但这是一个主观愿望问题,带领12亿中国人在21世纪走向崛起,还有一个能力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提出“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一些人往往关注的是意愿问题。但是有意愿不一定就能做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这个意愿。

《21世纪》:你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非常关注国家能力的建设问题。我们刚才谈到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面对一些新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理解国家能力概念?国家能力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王绍光:最近我和北京学者胡鞍钢和上海的学者周建明编了一本书叫《第二次转型》,副标题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换了一种方式把国家能力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要注意state rebuilding,即国家再造,重建中国的基本国家制度。我们认为这是第二代改革应该把握的核心问题。如果说第一代改革靠的是政策的变化,第二代改革靠的是制度的变化。后者是更基础性的。这并不是说以前的改革就不重要,而是说经过25年,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对国家的基本制度进行重构,这种重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国家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意愿,或者代表人民实现他们的意愿,这是至关重要的。

《21世纪》:这种国家能力应该不是笼统的,一个“良治”的国家还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王绍光:国家良治的八项制度基础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合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以及整合能力。我在下面分点说明。

强制能力是对外保卫政权和领土完整,对内维护社会秩序。

根据韦伯的定义,国家存在最基本的标志是其中央政府能不能在领土上拥有对暴力的垄断。一方面,国家必须有能力抵御外来的威胁。这就要求国家建立和维持一支常备军。另一方面,国家必须有能力维护内部的安宁。这就要求国家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经费充裕、纪律严明、着装整齐的专业警察队伍。这是人类社会的两个最需要的东西。

具体到中国,我们现在面临着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问题。中国经过25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息息相关,而且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外国来发展,作为一个大国有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是很少有的。这就使中国保护海上通道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进出口基本上靠海上通道,这是从进出口来讲的。

更重要的是能源。中国的石油现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要依靠进口。到2020年,现在一般估计依存度会达到50%~60%。美国现在是5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它大量的对外战争都跟石油有关系,这反映了它对能源的焦虑。美国本土的石油储量丰富,而对外



的供给通道畅通。中国最近从墨西哥进口石油美国也不高兴。中国的石油从哪里来呢？内部的储量肯定不够，那么就要从中东、俄罗斯、中亚等地进口。而这几个通道都有问题，从这一点上说，中国需要强制能力。再一个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统一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门户。这是从对外的关系来讲的。

从对内关系角度讲，维持社会治安问题自然需要足够大的、有效的警察队伍。我经常举的一个数字就是中国每十万人的警察数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所以从对外对内两个方面来看，国家的强制能力是我们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因素。

税改加强“汲取”能力

《21 世纪》：财政汲取能力你谈得比较多，简单说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中所占比例。根据有些人的理解，就是在税种的开征上要向中央政府倾斜，是这样吗？

王绍光：这也许有些误解。我倒不是说提高中央政府能力就是中央政府要加新的税。有些税该减还是得减，比如农业税。农业税每年大概 500 多个亿，这在整个 GDP 里面分量不重，我们每年财政收入的新征部分就有两三千亿。所以即便取消农业税，财政还是能负担得起。有些税可能是要加强征收的，比如个人所得税，这是一种调节型的税，主要用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有些新的税种可以开征，弥补取消农业税的缺失，比如房地产税。这种税针对不动产，所以征收较方便；另外它也是调节型的税，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最后还要把体制外的各种苛捐杂税和乱收费取消，或者并入正规的、预算内的税收。如果这一切都成功，税收占 GDP25% 左右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可以解决中国很多问题，包括刚才讲的国防和现代化的警察队伍。

“教化”形成核心价值观

《21 世纪》：不过仅靠暴力维持内部秩序似乎代价太高昂。

王绍光：是的，这就需要国家有较高的濡化能力或教化能力，这是国家基本制度的第四个要素。形成被广泛接受的认同感和价值观可以大大减少统治和政府运作的成本。濡化能力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形成要求人们把对家庭、宗族、地域的忠诚转化为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另外，国家同时必须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形成一套为大多数民众接受并内化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军事，在文化上也非常强大，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价值。什么使美国强大，就是“软实力”，而不完全是“硬力量”。中国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使别人接受你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完全破坏。传统的濡化方式显然已经不起作用了，如何形成新的，则还是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国家认同被绝大多数公民内化。其次，是慢慢培养一套核心价值观。出现某种被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

《21 世纪》：但是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的建立靠政府力量行吗？

王绍光：当然可以。这两者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要靠教育。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国家应该保证教育与市场保持距离。

“监管”弥补“教化”

《21 世纪》：濡化能力作用于人们的内心，政府如果要实行良好的治理，应该还需要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实行管理？

王绍光：这就需要有监管能力。监管的意义在于改变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使他们的



行为符合国家制定的规矩。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和权力不对称分布使得政府管治在现代社会变得十分必要。为了保护人民和自然环境，国家不仅必须制止明显的危害社会行为，还应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不同方式的管制。

另外，监管跟另一能力即统合能力有密切关系。我们现在监管为什么不到位，是因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连自身的约束还有一些问题。如果说监管能力约束的是经济和社会，那么统合能力强调的是政府对自身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行为的约束，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支高效负责的国家公务员队伍，以贯彻和执行政府的决策。这支队伍必须专业化，具备履行自己职责的必要专业知识和训练。现在存在两种腐败，一种是个人的，另一种是机构的。怎么遏制这两种腐败，在制度上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这就是统合能力的作用。

三项能力保证公平与民主

《21 世纪》：那么剩余的三种能力作用又是如何的？

王绍光：再分配能力是指国家在不同社会集团间对稀缺资源进行权威性的调配。再分配的目的一是保障社会中所有人的经济安全（基本温饱），二是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增强政府的认受性。有些人可能仅仅是不高兴，但不会“翻船”。发展再分配能力，也许会出现合作主义，即政府一方面有意愿做出补偿，另一方面也有能力做出补偿。中国在最好的情况下会趋向某种形式的合作主义。再分配是保证中国和平崛起的社会条件。

最后，实现良好的治理还需要吸纳与整合能力。说到底这就是民主问题。用罗伯特·达尔的话说，参与和竞争是有序民主的两个必要条件，这是从民众角度说的，从政府角度，就是吸纳和整合。

其次，政府应该建立制度，使不同社会团体表达出来的各种政策偏好得以整合。中国的整合机制有一定作用，但是不够。政府现在说要吸纳新兴的社会群体，但是问题是这些群体有大量的资源可用，甚至可以改变已经成形的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矿难不断，可是一直没有有效的制度创新。在这里，再分配不止是物质资源的再分配，而是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要加强表达机制加整合机制的建设，使各社会集团都有发言的机会。

这八项制度基础，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既提供了一个崛起的制度环境，也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环境。因为和平是一种意愿，能不能做到与能力有关。

动力来自于人民的推动

《21 世纪》：如同你刚才也提到的，一个政府要实行改革，既有意愿因素，也有能力因素，这两项是缺一不可的。政府的改革动力何来，你能否谈一谈？

王绍光：刚才提到的最后两项，就是吸纳和整合能力，从政府角度来讲是能力问题，但是从民众角度来讲，是保证政府有意愿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我很高兴新的领导班子已经讲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社会上所有主要的阶层都能参与表达自己的意愿，都能在决策过程中跟其他阶层的代表进行讨论、协商和竞争时，政府的意愿、也即选择余地就会有限，所以，吸纳和整合这两项能力保证了政府有意愿进行革新。

《21 世纪》：也就是说国家基本制度的创新不是政府主动创制的，而是取决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王绍光：对。

《21 世纪》：你刚才也提到中国现在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已经具备较强的互动能力。面对这样强大的利益集团，客观地看，怎么能赋权于普通民众？